

一位对推进学术事业矢志不移的老人

——纪念刘修业先生逝世十周年

中华书局编审 柴剑虹

1983年，我受命做王重民先生《敦煌遗书论文集》的责任编辑。因为王先生已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他的许多遗稿有待进一步整理——而承担主要工作的就是他的夫人刘修业先生，所以我就开始了与刘先生的频繁联系。由于刘先生年事已高，耳朵失聪，她的家乡方音又极重，所以开始主要的联系方式是书信；后来为了翻寻材料，她约我到燕东园的家中去，发现我居然能大致听懂她讲的话，再辅之以笔谈，交流更为便捷，她十分高兴，因此便频频地约我去面谈。尽管从书局所在地王府井骑车到燕东园，骑自行车要近一个小时，每次我还是风雨无阻地去见老人。我明白，这不仅是编辑工作的需要，也是为了接受一位对推进学术事业矢志不移的老人崇高精神与优秀品格的教育与熏陶。

刘先生对有三先生著作的整理是极为认真的，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经过十年浩劫，先生家中许多重要的原始材料已凌乱缺失，有时翻箱倒柜地找半天也一无所获，这对于一个年逾七旬、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来讲，真是困难之极，可她却从不言累、言歇。更让人感动的是，她也有自己从事了多年的研究课题（如吴敬梓研究），但此时几乎完全搁置下来。她不止一次地说：“我首先要做他（重民）没有做完的事，把他的著作整理出来，这样子才安心。”《敦煌遗书论文集》的初稿编成后，里面的每一篇文章她都校阅了不止四五遍。有时，为了一个字、一条资料的核查，她一天会给我发两封信。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写给我的信不下五六十封。有一回，为了整理敦煌写本《秦妇吟》的注释，她居然找出了1947年发表在《学原》一卷上的文章，将注释一条条地剪贴了一遍。如有新的收获，她就像个小孩子似地高兴得叫喊起来。她知道我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发表了一篇关于英藏《秦妇吟》写本新材料的短文，便要我补充到王先生的集子里去；她听我说对P. 2555卷中七十二首“陷蕃诗”有进一步的考辨，也要将它写为“附记”补入论文集。这一切，对于刚做编辑工作没几年的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与鼓励。

刘先生是位极坦诚、天真的人。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起她对王重民先生的深挚感情，讲他们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辛勤工作，讲他们在这个艺术之都的共同事业与美好的爱情生活，有时，还拿出两人在巴黎的浪漫合影给我看。她讲，就是抄录、整理流散到国外的敦煌卷子这个共同的事业将他们连在一起，而且永世永生不再分离。她也对我讲为什么她的乡音如此顽固——因为她到北京后活动范围很小，接触的都是福建人，很快又远赴欧美，没有机会学普通话。她也提到过当过清末状元的祖父，讲到家庭对她钟情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对

自己的孩子因学理工而不能承继父业而有些许的遗憾。她对在美国时与胡适先生的交往有十分亲切的回忆，赞扬胡先生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挚爱与贡献，认为历史应该还胡适以公正的地位。我记得她曾拿出两封胡适写给他们的亲笔信给我看，其中讨论了《西游记》的问题，可惜我没有记住具体的内容，而这信也不知是否还保存着。她 1932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3 年进北京图书馆，1953 年调入科学院历史所大半生从事图书资料工作，看重资料而不保守资料，愿意毫不自私地提供他人使之公诸于世，服务学术。我知道她自己无暇继续进行吴敬梓研究，却将许多材料无条件地提供给马蹄疾先生来做。有一次，她拿出几本稿纸来，上面是她亲自抄的胡适选注的《每日一首诗》（绝句一百首），这是她在美国时向胡适借原稿抄的，一直精心保存着。我觉得这对了解胡适的文学观及他在美时的心境很重要，遂向刘先生借来复抄了一本。后来，我邀了几位朋友，逐首评析胡适的选注，编成一书出版，并请刘先生写“前言”，当时刘先生的身体已经比较衰弱，但仍很快地交了稿。我想，先生心里应是很宽慰的。

1984 年夏《敦煌遗书论文集》出版前，刘修业先生参与整理的王重民先生的遗稿《中国善本书提要》也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刘先生说，王先生关于敦煌研究还有不少原始材料没有来得及整理，有的原稿又缺失难寻（如全唐诗补编），她已无力再做。她便在 1983 年冬提出要将王先生在巴黎做的原始卡片送给我。这些卡片数量甚多，又是第一手纪录，当然弥足珍贵。可我认为这么重要的资料不应该由我个人拥有，便向刘先生建议将它们送给敦煌研究院来保存与使用。我对刘先生说：“王先生搞了一辈子的敦煌研究，可他始终没有机会亲临敦煌看看，就让他亲手抄写的敦煌材料回归敦煌吧！”刘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带着刘先生的嘱托，当然也是带着王重民先生的意愿，于 1984 年 2 月将那些卡片和一些零散资料送到了敦煌。敦煌研究院还为此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接收典礼。隆冬的敦煌天寒地冻，我一人住在冷得使人无法安睡的招待所里，心里却是暖暖的，因为我将王、刘二位先生毕生为之倾注心血的对敦煌文化与敦煌学的热情带到了鸣沙山莫高窟。我带去的材料中，还有两封十分重要的信件：一封是姜亮夫先生寄给远在美国的王先生夫妇的信（大约在 1943 年）；另一封是 1956 年俞平伯先生回复王重民先生征求对补编《全唐诗》稿子意见的信（有若干具体的意见）。因当时我并没有留底，所以一直无法刊布。最近，敦煌研究院终于将整理王先生那些卡片资料列入工作日程，并请已退休的李永宁先生来具体实施，蒙永宁兄记得我多年来的要求，将这两封信的复印件寄来。我将会很快地公布信的全文。

在我和刘修业先生联系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都没有谈及王先生在文革中挨批斗、含冤逝世的事，因为我深知，我不能去触动刘先生心灵的痛楚，先生也已无暇去指斥那些颠倒黑白是非的小人，修业先生已经将她对重民先生深挚的爱，刻骨铭心地珍藏起来，并化作拼命工作以继承遗志、完成遗愿的动力；忠贞不渝的爱情，早已与矢志不移的事业心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坚信：在广袤明亮的天国，他们也是一对最美丽、刚健，光彩夺目、形影不离的飞天！愿他们自在翱翔！

2003 年 8 月 3 日于中华书局